

文章编号: 1674-5566(2010)04-0567-05

清末政治转型失败的原因探析

龙红飞

(上海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 上海 201306)

摘要: 晚清的中国社会曾出现过艰难的政治转型的实践过程, 历经设总理衙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和清末新政立宪运动, 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以悲剧的形式而宣告失败, 清王朝也因此走向终结。毋庸置疑, 清末政治转型失败是各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因为政治制度有其运动的惯性, 从宏观的角度分析, 任何一次政治转型能否成功, 其基本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它的变更要受到历史传统、现实环境、主观意志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对历史进行仔细梳理, 导致晚清政治转型失败的关键原因有三个: (1) 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致使转型缺乏社会动力与活力; (2) 传统士人阶层气象的丕变导致组织制度的缺失; (3) 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崩溃使转型缺乏精神基石。研究总结这一历史实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 更可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供借鉴。

关键词: 晚清; 政治转型; 失败原因

中图分类号: K 252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f the reason of failure for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ONG Hong-fe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hard practical proces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ideologically originated from abroad, such as Establishment of Yame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the New Constitutionalism. However, all these initiatives finally failed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ended. Needless to say, the failure of the late Qing political transition was the various “forces” effect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t the time determine the success of any political transition because of many politically checking factors like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social reality, subjective will and the other factors. Through combining of the late Qing history carefully, I think there are three key reasons leading to the failure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1) Lack of motivation of the transition was caused by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2) It was lack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because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class changing radically weather; (3) The transformation lacking the spirit foundation was caused by the spirit of the cornerstones of Confucianism as the core collapse of traditional ideology. It is useful to study and draw experience from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in that period of time in order to promot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nowadays.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reason of failure

收稿日期: 2010-03-16

基金项目: 上海海洋大学人文社科项目 (A-0211-09-0285)

作者简介: 龙红飞 (1974-), 女, 在读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研究。E-mail: hlfon@shou.edu.cn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9世纪40年代后,近代中国经历了设总理衙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三次政府主导型的政治体制改革^[1],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以悲剧的形式而宣告失败,清王朝也因此走向终结。毫无疑问,清末政治转型的失败是当时各种内外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宏观上分析,导致晚清转型失败的“合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转型缺乏社会动力与活力

众所周知,任何变革都要从思想观念的转变开始,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必须以思想文化的变革为先导。由于不同的文明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其应对变化的适应能力自然就有很大差异。一般来说,一个基于相对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化主体往往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反之亦然。中西文化冲突是晚清政治改革动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晚清中国要改变传统观念,冲破古老的文化大国情节,并非易事。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小农社会,保守、自我封闭是其基本特征,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它不仅支配着统治者的文化心理结构、情感态度、观念意识和价值体系,而且成为庶民百姓的价值信仰中心,浸透到他们的理想和民间习俗中,甚至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生存选择和实践精神”^[2]。农耕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和内向性,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配合,导致传统中国文化形态具有早熟性的特点,对传统文化本身的发展趋势、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以及以后的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念体系与思维方法等等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最终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其文化心理的惰性日益彰显,成为阻碍政治转型的结构性缺陷。

1.1 自我中心主义情结使其缺乏自觉认识外部世界的方法论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悲的就在于面对复杂而险恶的国际环境丧失对周围世界的判断能力和自我意识。不可否认,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主体,不但维系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还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可到了近代,当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开放和交流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时,自周秦以来形成的以孔子为轴心的文化传统不但再不能为社会机体注入新的活力反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沉重历史负担和强大阻力,而且这种阻力又往往

与既得利益扭结在一起,沉积为一种保守的历史惰性和习惯势力,形成一种强大的抗改革因素。千百年来,传统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世界”,把建立在传统儒家纲常伦理基础上的华夷等级秩序作为划分天下文明的标准,这就与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价值体系多元性的现实产生严重对立和冲突,这就要求其能对“异质文化因素有较大的容受力和吸收融合能力”^[3]。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经典地位在社会转型到来之前从未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动摇,而且它在历史上曾经成功地吸收和融合过外来文化,并有效地整合过许多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优越感,使得其自我更新的潜势很弱,最终导致对外来文化的强烈排斥,成为晚清政治转型的“绊脚石”。当一个沉湎在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中的古老民族不得不进入国际化竞争时代的时候,它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1.2 高度同质化的价值体系导致自我更新机制的缺失

自西汉以来儒学定于一尊统一全国思想,排斥其他文化使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导致中国失去了多元文化相互竞争促进的文化机制,士绅内部阶层缺乏最起码的多元化,泯灭了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正如一位西方思想家所说的,只有当无数微观个人将其获得的知识与所处的特定环境进行调适,文明才能得以累积性地进化,一个社会才能在应对机遇偶然的事件中,获得文明发展的更多的动力。由于在长期封闭的、大一统的体制下的中国人,从士绅、官僚到一般下层民众,基本上受的是同样的文化训练,经受的是同样的文化冲击,视野、态度也大多雷同,社会分化的水平很低,价值与观念态度的多元化程度很低,各种观念、价值与政治主张之间缺乏制衡与缓冲。正因如此,传统的儒家文明在应付外部文化冲击时所表现的麻木愚钝或不知所措的反应态度就不难理解了。“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4]。当古老的中华文明不得不与另一种强大的西方文明相碰撞与冲突时,由于缺乏一种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能动的综合反应的能力,它就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被动与挫折,最终导致转型的失败。

可见,尽管中西文化碰撞和冲突产生的强烈的危机意识迫使晚清考虑政治转型,由于这是儒家文化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另一种更强有力的外部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的自我中心意识的文化传播模式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定势,不可能具有世界各种异质文化多元并存的文化心理,使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5],难以实现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并最终使近代中国陷入民族生存危机的境地。

2 转型缺乏可担当的主体力量

历史证明,政治转型的成功必须要有一个有能力的担当主体。这个能担当的主体阶级必须拥有坚定的代表现代和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理念,且在保持内部高度政治团结的同时还得注意协调社会各主要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千百年来,儒学精英中的士大夫群体通过科举制度得以晋升,与封建王权一起一直担当社会稳定和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但到了晚清,随着一系列政策的推行,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气象发生重大丕变。

2.1 思想钳制政策使士阶层无法为政治变革提供智力支持

尽管儒学崇尚“忠君”,但儒学精神中也有“正君”的一面,即知识分子能够批评帝王,规范君权。从历史上看,儒学精英一直执守自孔孟相传的济世之心,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一直与君权一起成为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担当主体。从孔子以来,史学曾培育灌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并以兴亡、安危、利病使他们与国家社会相维系。有经世之心的知识分子,经常通过读史阐发议论,从前人的行迹中讨求是非成败之理。在传统中国,儒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知识分子的士气大多就是从谏争和议论中涌出来的^[6],所以儒学中的优秀人物常常有一种自觉的师道意识,到宋明时期更是以主流文化的方式传承了600多年。虽然很少有君临天下的人喜欢知识分子的师道意识,明代君主更是用廷杖来对付言路,但敢于“任斯道之南面”的儒学中人却后继不绝。

清政府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不仅具有历

代王朝集权政治的特点,更由于是一个由满人统治的核心政权,使集权政治更加强化。统治者们运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坚决维护专制制度固有的统治秩序,甚至把“控制效率(利用诱惑和恐吓)提高到了窒息官僚阶层内部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地步”^[7],导致传统士人阶层气象发生蜕变,明哲保身成为清儒的主流。清王朝不能容忍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专门划出读书人的思考范围,剥夺了他们悲天悯人的权利,还通过文字获罪的方式,采用严酷手段剿洗异路思想,向每个读书人昭示思想和文字出界之后带来的家破人亡,让士人体会到人主面前已无师道。于是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有心报国的士人的政治意识日渐淡漠,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济物利人之心和规范君权的意识日渐萎顿,最后直接导致读书与立身的完全割裂,他们所关心的东西与世局和众生相隔很远,“为学问而学问”,“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6]。“士林中的慷慨激越、苍凉深沉已经消失殆尽,士人群体的气象也在恣意的君权面前一点点地变得奄奄无息。如此一来,在一个义与理日见萎谢的时代里,再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和盲目自大,士人的眼界越来越窄,严重窒息了官僚阶层内部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6]。直到鸦片战争前,在外有强敌,迫在眉睫的情况下,清王朝依然昏昏沉沉,毫无生气。儒学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本是以牺牲其向世俗理性的转化来实现的,儒学对政治秩序的稳定作用,本是以顺从专制权威、煽动思想奴性来实现的。到了清代,这种状况更是无以复加。所以经过两百多年的高度思想钳制,早就使士人群体对义与理疏离,与君权在精神上的貌合神离,当中西文化激烈交冲时,士大夫群体所表现出来的颟顸无知很难在短时间内为政治变革提供切实的智力支持,更不可能担当政治转型的主体支撑力量。

2.2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其缺乏政治转型的领导力量

科举制度是传统的士人与政治结构的联系中最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士人政治形态的生命线^[8]。在传统社会,通过科举制度造就的庞大士人阶层既属于统治阶层,也是清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由于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和科举制度自身的问题,这一制度1905年被废除,士人政治的生命线由此崩裂,“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

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造成其大规模分化，士人阶层随之迅速解体，开始了传统中国社会上层在体制上的一种自我摧毁。

废科举后，政府没有适时地推出替代性制度，原有皇权与绅权的相对平衡状态不复存在，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被打破，士绅阶层被迫向其他社会阶层分途流动，直接造成社会文化精英的断层，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后来胡适所说的“国无重心”的局面，使得清政府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依赖的统治阶层。原来效忠王朝的士人阶层失去了位居社会中心的制度保障，从思想和社会的中心步步淡出，逐步被边缘化；新式学堂产生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又缺乏社会根基与地位；传统社会下的农、工、商本质属于被统治阶层，不会与清政府同舟共济，更不可能成为清王朝统治的核心力量。尽管军人阶层由社会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一跃成为社会的主干和领导者。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军人对其专业外的知识普遍缺乏，也不具备深邃、广阔的现代化目光，且又过分迷恋武力，因而不能承担对社会的整体领导作用，自然也不能成为定型社会基本制度的力量，反而最终发展成为割据一方、祸国殃民的军阀^[9]。从制度层面上讲，造成这种状态的深层根源，应与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分不开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清王朝废除科举制度最大的后果就是将精英阶层剥离于其统治之外，间接地为自己培养了政治反对派和掘墓人。它造就了一代反对王朝统治的新型的知识分子群，却疏远和瓦解了曾拥护王朝统治的旧的知识分子群体。士阶层的背离，使清政府的核心力量空洞化^[10]，国内无任何一个阶层的精英肯为之服务，使政治转型失去了社会性的领导力量和制度支撑，仅仅成为极少数人或激进或保守的独角戏。

3 转型缺乏精神基石

中国政治，政权的合法性对意识形态的依赖性很强，意识形态的斗争常常会成为制度变革的先导。如果说传统士人阶层气象的丕变掐断了中西政治文明可能对接的某个管道是清末政治转型失败的原因，那么士人群体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彻底分裂就大大削弱了政权合法性的根基。

3.1 传统意识形态无法回应西方挑战致使社会出现信仰危机

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对晚清改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进入近代，中西碰撞产生的强烈的危机意识是导致知识分子产生社会批判思想和变革思想的真正动力。“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理念是天命——圣王——道德所组成的三位一体”^[11]，儒学既是一套道德、政治学说，又是一种信仰体系，既是封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支撑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价值系统与文明形态的冲击，中国被迫出现了对文明危机的反应。但是中国现代化所需的信念建构始终无法摆脱悖论性的命运，为防止文化失范要求助于传统，而现代化的新生政治又须抛弃传统，这是中国政治转型中特有的困境与尴尬。晚清政治转型要对传承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理念进行颠覆性的改变，必然要冒文化失范的巨大风险，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也正是西方文化转型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最大区别所在，无论西方文化转型的过程是如何的轰轰烈烈，但西方文化的根基没有被置疑和推翻，其要解决是同一种文化的继承与变革；而中国的文化转型是在西方世界的挑战面前作为被迫启动而展开的，因此首先面对的困惑就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异质型的西方文化的两难选择^[12]。晚清的改革目的和改革措施本身存在着文化上的剧烈冲突。从本质上说，他们仍然固守以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真正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进行改革，其结果将是整个封建大厦的倒塌，这是他们既不愿意看到的；但他们又不得不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传统的那一套已无法维持其统治，如果不改革，他们的统治和整个封建大厦也将不可避免地颠覆。加之清王朝是一个“嵌入式”王朝，其政权的根基一直在汉人手里，当面临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后，整个政权不可避免会受到内外双重夹击。

更糟糕的是，中西文化交冲导致民族意识的复苏却首先激活了一直深藏在儒学中的种族意识。士人纷纷把反满意识作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就直言：“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孙

中山也是以排满为抱负,其三民主义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前提的。这就使得文明危机反应的主体一直面临一个困境,也就是要先处理好满汉族群之间的权力矛盾,因而无心进行彻底革命性的变革。后来太平天国使整个帝国体制出现大翻转,汉人社会凸现,最后穷途末路,清王朝塌陷。由于晚清政治转型内容空泛而缺乏固性和厚度的东西,最终导致70年没有找到中国政治转型的合理路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处在世界政治大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下,满清王朝替代明朝汉人王朝是中国政治转型失败的历史宿命。

3.2 废科举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为载体,与科举制度联系密切。由于科举制乃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根本制度,科举制的废止就导致了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重塑之间的文化断裂,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信仰体系的崩溃,人们普遍处于精神上的迷惘与困惑,社会转型失去了必要的共同信念基础。这两方面的后果又直接产生了近代知识分子普遍性的认同危机。尽管在中国历史上,自有士大夫以来就有朋党和政争,士人和士人的冲突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朋党和政争都是在同一个意识形态中进行,因此,君子儒和小人儒虽已品相分群类,却仍然同在一个政体中。但中西文化的交冲,引入了以西学为知识和思想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当一部分有功名的人和另一部分有功名的人各有一种意识形态时,士大夫群体便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裂,“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13]。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士大夫群体始终代表着共同的文化和共有的价值,稳定地支撑着中国的社会结构,成为历史变数中的常数。儒学支配下的社会政治秩序是一个全面的体系,一旦“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整个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即走向崩毁。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着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科学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14]。从长远看,废科举使中国出现文化断裂,儒学上千年独尊地位从根本上打破,昔日儒学的神圣灵光顿时失色,整个民族处于信仰失落和价值危机之中,社会价值体系也由此发生转移。之后,人们的价值取向不断趋向多元化,传统儒学在中国日趋式微,西方思想文化如潮水般涌入,整个思想界呈现出多元纷争、空前活跃的局面,于是立宪主义、共

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积极孕育并蓬勃发展起来了^[15]。至此,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上的作用不仅从制度上已经解体,更从士人的观念中开始瓦解。而在全新的制度体系中,儒家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同样儒学也不可能为新的制度体系提供合法性依据,而中国现代化所需的价值理念又很难在短时期内建立,导致晚清政治转型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

综上所述,政治发展是一种正向的政治变迁,在政治转型中,各种力量的对立不仅表现为政治利益的冲突,而且更多地表现为文化的冲突。晚清政治转型属后发外源性的政治发展,这就决定了晚清政治要成功必须面临文化转型、组织重建和信仰重塑的难题,只有突破这三大难题,清末政治转型才有可能成功。

参考文献:

- [1] 梁严冰,刘蓉.关于晚清政治体制近代化历程的思考[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3,19(4):50-53.
- [2] 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59-261.
- [3] 萧公秦.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的碰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
- [4]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M].朱曾汶,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6.
- [5] 郑淑婷.钱穆的中西文化差异观[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7,16(1):75-77.
- [6]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M].北京:三联书店,2008:38.
- [7]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75.
- [8] 刘焯.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119.
- [9] 张昭军.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J].史学月刊,2008,(1):61-69.
- [10] 杨洪远.浅论士、科举制度、清朝灭亡三者互动关系[J].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7(2):28-30.
- [11] 萧公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50-56.
- [12] 刘世军.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0-45.
- [13] 萧公秦.从科举制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J].战略与管理,1996,17(4):11-17.
- [14] 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J].战略与管理,1996,17(3):45-51.
- [15]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55.